

丛书

我经历的 20 世纪

牵手亚太

——我的总理生涯

澳

保罗·基廷 著

中

郎平 钱清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丛
书
我经历的 20 世纪

【澳大利亚前总理】 保罗·基廷 著

牵手亚太

——我的总理生涯

郎平 钱清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牵手亚太:我的总理生涯/(澳)基廷(Keating,P.)著;

郎平,钱清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12

(我经历的20世纪)

书名原文:Engagement:Australia Faces the Asia-Pacific

ISBN 7-5012-1661-4

I.牵… II.①基…②郎…③钱… III.①澳大利亚-对外关系-亚太地区②澳大利亚-对外政策-亚太地区

IV.D8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7963号

图字:01-2001-4214

书 名 牵手亚太我的总理生涯

责任编辑 凌 飞

封面设计 麟 生

责任出版 王勇刚

责任校对 何 姣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电话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010)65122235

邮政编码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 北京力托科技有限公司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开本印张 850×1168 1/32 9¼印张 213千字 4插页

版次印次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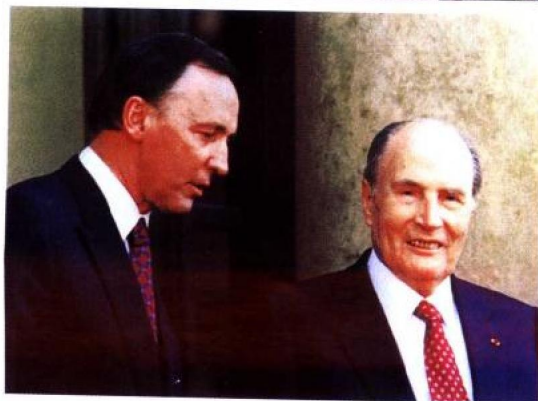


1994年11月第二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与中国主席江泽民会晤。

我和朱镕基总理第一次见面时他还是上海市市长。



与日本天皇明仁会晤。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关系在80年代有了长足发展。



1994年6月和法国总统密特朗在爱丽舍宫。

茂物高峰会议前夕与苏哈托(左)总统商谈有关事宜。



1993年第一次与马来西
亚总理马哈蒂尔会面。



1993年11月在西雅图参加第一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出访巴布亚新几内亚，携女儿一同感受当地丰富多彩的文化。



在波茨坦市参观德国古典建筑精品。

中 文 版 序 言

或许，我们正在迈入的新世纪与上个世纪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将会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

由邓小平、江泽民和朱镕基等中国领导人发起的改革进程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和公共政策成就之一。它释放了 13 亿中国人的创造力，确保了在 20 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一直被置于国际社会边缘和任人摆布的中国将具备足够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推动新的国际体系的形成。

那是一个伟大的责任。

冷战结束十多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定的时期。我们曾有许多机会塑造一个更为广泛、更具合作性、更能反映世界现状的全球秩序，但我们却未能把握住这些机会。

当前的国际体制无法满足我们应对所面临的挑战的需要。例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仅由二战中的战胜国担任；“八国集团”未能包括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如果我们在禁止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同时，却继续认可另一些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享有这种特权，如果我们天真地认为真得可以一些国家在坚固的导弹防御盾牌后面享受繁荣和安全，同时却听任身外的世界贫困无助，认为二者可以并行不悖，那么我们将发现，我们无法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中国若想积极、有效地运用其新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它将需要研究和理解周边国家的想法及利益所在，与其他较小的伙伴国进行磋商、合作，为健康的、富于包容性的地区体制的形成做出自己的贡献。

通过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观察澳大利亚——中国重要的地区伙伴之一——外交政策争论的视角，我希望本书将能推动上述进程的实现。

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时，我觉得我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是重新将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聚焦到我们与亚太地区的关系上来。

我始终认为，澳大利亚需要在亚洲寻求安全，而不是像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从亚洲获取安全利益。澳大利亚应该通过把握自身所在地区即将出现的机遇来创造自己的未来，而不是寄希望于过去形成的历史联系。在世界的这个部分，我们生活其间，我们的所有利益亦直接根源于此。

这本书讲述了我我和我的同事们在1991~1996年这段时间如何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的故事，以及我们希望获得的结果。

尽管我（作为澳大利亚总理）的继任者背离了我所坚持的一些政策，更加重视澳大利亚与欧洲和北美的联系，但是我相信，除了与亚洲更紧密地接触之外，澳大利亚没有其他选择。地理因素、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日趋紧密的文化、社会

联系，所有这一切都必然推动澳大利亚与其邻国发展更为密切的往来。

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和澳大利亚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伙伴。两国经济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不仅在一些澳大利亚长期作为中国重要供应商的传统领域，如矿业、能源和农产品，而且在众多的服务行业，诸如医疗、金融服务、环境技术和教育，情况都是如此。

澳大利亚的人口也许算不上多，但我们却拥有广袤的国土。我们一个国家拥有整个澳洲大陆。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同样具有中国的多元化特征。在令人吃惊的众多中国可能寻求合作的领域中，从旱地种植到热带农业，从为边远地区提供社会服务到城市规划，澳大利亚都可以为中国提供帮助。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社科院世经政所的郎平女士。正是有了她们的帮助，这本书才得以与广大中国读者见面。



保罗·基廷

致

谢

尽管在本书以后的叙述中，我自己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但我当政时实施的对外政策和行动包含了很多人的智慧和心血。在我担任总理期间，我们的对外政策得到了一个强大的部长班子的支持，这不仅是我的幸运，也是澳大利亚的幸运。我相信，加里思·埃文斯凭借其智慧、创造性和政治勇气，完全可以成为这个国家最出色的外长。与他同样出色的还有约翰·凯林、彼得·库克和鲍勃·麦克马伦，他们在乌拉圭回合、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双边贸易的谈判中表现出众；罗伯特·雷在金·比兹利防务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澳大利亚防务政策的重新定位；戈登·比尔尼，他有力地推动了太平洋和援助政策的几项重要改革。这本书不仅是我的故事，同样也是他们的故事。

像我一样，他们得到了很多身边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同时，我们也离不开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门的大力协助，而他们的作用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所有这些人在工作的创造性和效率方面丝毫不逊色于他们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同行。

我和我的政府得到了澳大利亚官员们的鼎力支持。我不可能在这里列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事实上，有很多人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尽管如此，我仍然非常感谢他们。我特别要感谢在这期间担任外交贸易部副部长的迈克尔·科斯特洛及其下属的高级职员们，他们远赴海外执行使命并常常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和困难在勤奋工作，另外还有澳大利亚海外援助计划的工作人员们。在很多时候，迈克尔·基廷博士和总理及内阁办公厅的官员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国际司的勤奋工作，大部分时间担任这个部门负责人的是迈克尔·索利。另外，我还要感谢澳大利亚防务部队中一些高级军官的支持，他们包括彼得·格雷申将军、艾伦·博蒙特司令，后来还有约翰·贝克将军，以及国防部的官员们，例如托尼·艾尔斯和休·怀特。

在我自己的工作人员中，唐·罗素、唐·沃森、约翰·波万、约翰·爱德华兹、里克·西梅斯和杰夫·沃尔什都为本届工党政府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还有我的主要国际事务顾问阿什顿·卡尔弗特和阿伦·金吉尔。

在离开议会之后，我很愉快地担任了新南威尔士大学公共政策专业的客座教授，本书的部分章节就节选自我在那里所做的报告。我很感谢副校长约翰·尼兰德教授及其同事们——包括亚洲澳大利亚学院——的热情帮助。

我还要感谢帕恩·麦克米伦在本书的准备过程中所给予的支持。阿曼达·亨明斯和朱莉·尼科奇为本书作了大量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如果没有阿伦·金吉尔的支持，这本书就不会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在1991年担任总理和内阁办公厅国际司司长、1993年后担任总理办公室外交政策顾问期间，直接参与了这本书中所讨论的大多数问题。1996年以来，他在“基廷

伙伴”公司中继续与我一道工作，并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前

言

澳大利亚如何同周边地区相处对我们将来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至关重要。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在任总理的 1991 ~ 1996 年间,我和我的同事们共同做出了很多重要的决定。我认为,如果把这些决定的背景以及我们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的认识披露出来,将会引起大家的兴趣,也有它长期的价值。这些事件与我们当时试图要做的其他很多事情紧密相关,对我们仍在为之努力奋斗的在世界中构筑澳大利亚的未来的工作也至关重要。另外,我也想指出澳大利亚在将来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外部挑战。

本书所讲述的并不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历史。它甚至谈不上是我任总理期间外交政策的历史。因为那段时间里世界上发生的很多重要事件,在本书中都没有提到,或很少提及。例如,联合国改革,中东和平进程,印度洋的首次地区合作等。本书的各个章节分别记录了我个人感兴趣或是作为总理很大程度上直接参与其中的一些事情。总的来看,它们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有关澳大利亚与周边地区接触的故事。

目

录

3	中文版序言
7	致 谢
11	前 言
1	第一章 1991 年
23	第二章 “本街区最大的一只狗”
44	第三章 “北方的部落”
72	第四章 构筑亚太共同体
93	第五章 茂物和大阪会议
117	第六章 我们最大的近邻
149	第七章 我们周边的东南亚国家
182	第八章 其他太平洋国家
210	第九章 核阴云
228	第十章 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
259	第十一章 进入新的千年

第 一 章

1991年

距亚洲大陆不远，有一块面积广袤的大陆，那就是澳大利亚。有关澳大利亚人民如何逐渐认识到他们在世界中的地位，是个漫长且远未结束的故事。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中的一小部分。

早在 200 多年前，英国殖民者在杰克逊港建立了一块殖民地，澳大利亚的历史自此拉开了序幕。英国此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对抗法国的挑战，确保与亚洲贸易通道的顺畅，以便获取巨额利润。自那时起，澳大利亚就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对威胁的认识和对机会的把握。随着我们逐渐认识到澳大利亚同英国在利益上会存在分歧，因此抵御风险、抓住机遇就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主旋律。

下面的内容既包括我作为澳大利亚总理在对外关系中的一些亲身经历和感受，也谈到我对澳大利亚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本地区未来前景的一些思考。因此，这本书与其说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所做事物的记录，不如说是对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的解释。

1991年12月19日，我接替鲍勃·霍克当选为议会工党的领袖。在政界，一个人要自己选择时机无疑是一种奢望，而正如大家所知，这个时机也并非我自己的选择。但不可否认的是，我成为澳大利亚总理的时机却再有趣不过了。

1991年底是我所认为的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这个世界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时代，它不仅在形式而且在程度上都与我们从前所熟知的世界迥然不同。1991年以海湾战争中的“沙漠风暴”行动而始，最后以苏联的解体而终。那时候，大家把针对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而组建的多国联合部队看作是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合作方式，并且认为，随着联合国地位的提高和大国之间合作的加强，冷战中的分裂最终将被一种“世界新秩序”所取代。

但是，年末在海湾联盟内部出现的分歧表明，它并不能够为将来提供一种可持续的合作模式。所谓的“世界新秩序”对世界上右翼阴谋理论家的意义要远远大于那些真正试图去研究国际体系新变化的人们。每当描述当今世界时，政治家和他们背后的智囊总是不得不采用“后冷战时期的世界”之类的字眼。这恰恰说明了用历史来定义我们如今的世界要远比用未来即将发生的事容易得多。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都似乎生活在一个“后××”世界中，例如“后冷战”、“后现代”、“后工业化”等等。从我们的语言中不难看出我们对未来的事物缺乏信心。

自二战结束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两极世界中。我们总是把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划进东方或西方阵营。即使是一个刚刚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它也不得不在两大阵营的夹缝中求生存。

对两大阵营来说，冷战不仅是地缘战略上的，而且体现为意识形态的冲突。也就是说，冷战的根源在于双方观念的